

一段文學情緣——序丘彥明《人情之美》

◎鄭樹森（美國加州大學榮休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嶺南大學特聘教授）

丘彥明一九七〇年代後期進入《聯合報·聯合副刊》當編輯的時候，舊民國的一批著名文人東渡臺灣已三十年，都步入暮年歲月，例如二〇年代末就嶄露頭角的魯迅弟子臺靜農教授、三十年代參加《新月》的葉公超大使、多次和魯迅筆戰因此日後名字進入《毛選》的梁實秋教授等。而四十年代末才開始寫作的文藝青年也都邁向花甲，例如散文家吳魯芹教授、歷史小說家高陽先生。

算是這一群民國文人的弟子輩的作家，這個時候風華正茂、備受文壇矚目；例如大學時代就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的小說家白先勇先生、在《現代文學》發表譯作的綠色生態作家孟東籬先生、在《現代文學》以本名陳平發表少作的旅遊作家三毛女士、在《現代文學》發表第一篇小說的王禎和先生等。與白先勇和孟東籬不同，臺灣花蓮土生土長的王禎和沒有任何老民國、舊大陸的記憶，但唸花蓮中學的時候，得周作人弟子、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的郭立誠老師介紹，罕有地知道當時鮮為人知的張愛玲，曾自行搜羅張愛玲的小說來研讀；早年未發表的作品，據其生前自述，當刻意模仿張愛玲（這一點亦得王禎和

兄花蓮中學同窗、臺北洪範書店主持人葉步榮先生旁證），由是種下日後熱情接待張愛玲的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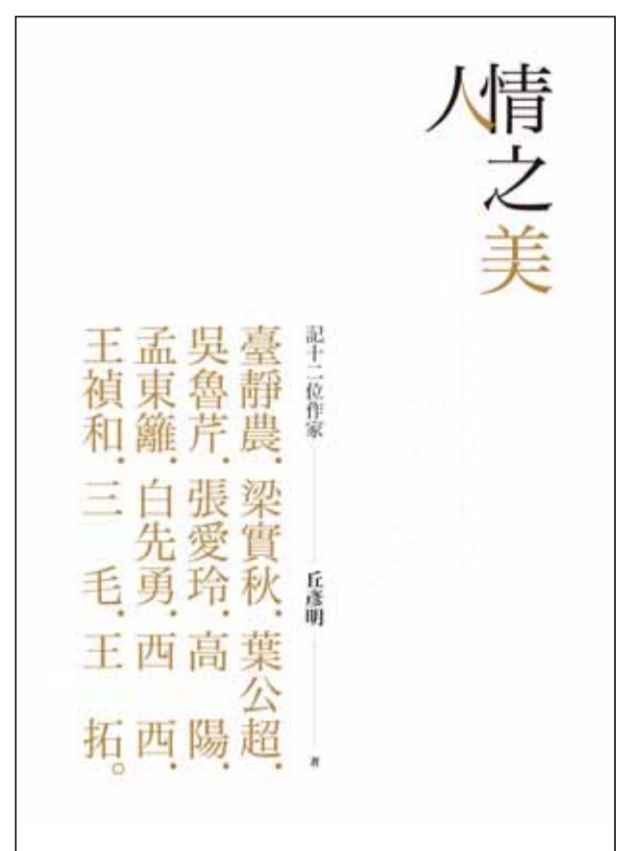
也是因緣際會，丘彥明進入《聯合報·聯合副刊》的時候，正值經濟起飛、政治開始寬鬆，副刊銳意革新，力謀擴大版圖，爭取讀者。由於臺灣長期戒嚴，又有不能開辦新報、原有報紙限定張數等箝制，報紙的主要戰場很自然由新聞版轉移至沒有太大掣肘的副刊。留學英國、曾任東北行轅新聞處處長的余紀忠先生創辦的《中國時報》（原《徵信新聞報》），安排青年詩人高信疆（高上秦、高歌）出主《人間副刊》。信疆兄上任後推動新議題、提倡新文類（如報導文學）、發掘新作家、鼓勵新創作（開辦文學獎），令到另一大報《聯合報》力謀反攻，禮聘自美返臺的原《幼獅文藝》月刊主編詩人痲弦（王慶麟）先生出掌《聯合副刊》。據痲弦親述，當年飛機抵達臺北松山機場時，信疆兄搶先接機，馬上直奔《中國時報》大本營，連同余先生全力遊說，甘詞厚幣之餘，另加住宅安排，務求痲弦能「陣前起義」。臺灣兩大報當時戰況之激烈於此可見。

弦重言諾，不願臨時反戈，脫身後還是到《聯合報》主持副刊，由是丘彥明才會成為他最得力

的副手。彥明的主要工作就是和老作家及中生代聯絡。這種聯絡和今天的年輕編輯做個短訊大不相同。書信必定手寫，深入瞭解作家的背景和作品不可或缺（不然拉稿時豈能言之有物），逢年過節必定致意，有時候更免不了代辦一些瑣事（尤其是海外作家）；經年累月，老輩作家和彥明的關係自然變成一師半友，不少中生代作家更是一輩子的朋友。

一九八三年《聯合報》全盛時期，王惕吾老董事長頗思回饋社會，痲弦主張辦一份大型文學刊物。在王老先生支持下，一九八四年秋《聯合文學》月刊創刊，痲弦出任社長兼首任總編輯，彥明自此又多一重擔；到一九八六年年末，更接任總編輯，至一九八八年初赴歐休息進修為止。離臺前更獲臺北最高行政當局的年度最佳雜誌主編金鼎獎，替她這段編輯生涯劃下完美句點。

彥明這本書所記載的雖祇是她十多年編輯生涯中特別珍惜的一些情誼，但卻為文壇記下舊民國老文人的晚年風采，也為當年中生代作家的崢嶸歲月留下寶貴的記錄，因此意義絕對遠超一己人情之美，而是文學史的一手材料。彥明這一段文學情緣，我有幸在港、臺、美三處越洋或在地



參與，也就不揣淺陋，略為勾勒當年脈絡，以便今天的讀者。

讓風景永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化風景》

◎李劫

二十多年前，在上海靜安寺的一個密宗道場裡，友人請特異功能者給我看看。那人坐到我跟前，閉上眼睛入靜一會，然後睜開，說了一番話。有關前世今生。前世諸事，難以考證；但今生之事，無法造假。那位對我日常人生一無所知的異人，說我同時在寫兩本書。這讓我非常吃驚。我是個單通道，通常都是做完一件事然後再做下一件，偏偏就在那個時候，確實正在同時寫作兩本書。一本是今年初在臺灣出版的論《紅樓夢》，一本則是明年初準備出版的這本《二十世紀西方文化風景》。兩本書寫完後，當時全都在大陸先後出版了。如今，其繁體字版則由允晨文化公司陸續面世。

這兩本書的論述對象，似乎是不相干的。一者是二十世紀西方文化諸子，一者是中國文學的經典作品。之所以會同時著述，可能是因為彼此之間的交叉所致。一面以海德格的存在論闡述《紅樓夢》的哲學意味，一面又從老子的東方哲學觀照

說海德格。著述期間，一再引述威斯康提電影《豹》的經典臺詞感歎豹的消失，綿羊的氾濫。倘若我說賈寶玉是剪除了齒爪或者說喪失了侵略性的希特勒，人們一定感到很吃驚；一如我說希特勒是長出了齒爪從而極富進攻性的賈寶玉，會讓人不知所云。這兩者對女人的心腸非常相近，賈寶玉的憐香惜玉不用說了，希特勒把德國男人驅趕到戰場上的時候，非常眷顧德國婦女，全都養在家裡，並且享受戰俘的伺候，不讓她們遭受戰爭之苦。

有不少讀者認為，一部《二十世紀西方文化風景》，最精彩的部份，莫過於論說希特勒的第八章。但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第六章，綜述從

林布蘭到畢卡索的西方繪畫歷程。想當時，還不曾出國遠遊，從來沒見過博物館內的真跡原作，只是憑藉一本本畫冊，便作出了那麼洋洋灑灑的畫論。想想有些托大。不料後來有美術專業的讀者讀了，驚然驚為天人，讓我承蒙謬獎得不行。

若從思想學術的深度著眼，此著最讓我滿意的是論說維特根斯坦的第五章。二十年後，當我書寫《中國文化冷風景》的最後一章最後一節，有關公孫龍子的語言邏輯思想時，就是靠了那一章中論說維特根斯坦時的一些感想和發揮，才找到了如何最簡潔最明快地講說公孫龍子的方式。

由此可見，西方諸子和中國文化，在我的思維時空裏是交融的，有時反差強烈，有時互相補充。也正是這樣的交融，使我忍不住把有關印度靈修大師奧修的感悟，安置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化風景裡，權作最後一章。其情形一如我將古巴的切·格瓦拉作為二十世紀的堂·吉訶德，置入有關共產主義運動的評說裡。

倘若共產主義僅止於仗義行俠，那麼切·格瓦拉是最經典的偶像。但共產主義並非仗義行俠，因此切·格瓦拉最後成了六、七十年代歐洲恐怖分子的樣板人物。人類需要神話級的偶像，諸如基督、佛陀便是。而族群也喜歡有個英雄可以崇拜一下，希臘有亞歷山大，羅馬有凱撒，法國出了拿破崙，德國出了希特勒。是非曲直自有評說，但就各個族群而言，不會從記憶裏抹去。英雄崇拜是非常人性化的，既有人人的壯觀也有人的醜陋。

相比之下，科學或者藝術，有其獨自的永恆性，或者說神性。比如愛因斯坦相對論，量

子力學，或者偉大的畫家，傑出的文學家。他們是不能以族群來界分的，雖然他們的文化背景很不一樣。倘若說此著有何欠缺，那麼應該是論述繪畫時，尚未有過在博物館裏親眼目睹原作真跡的經歷；講說文學時，還不曾領略喬伊斯、普魯斯特、波赫士的精彩。更不用說，當時沒來得及寫上有關西方音樂的章節。這些缺憾，都是在後來的寫作當一一彌補的。比如《美國風景》（同樣也在允晨出版）有西方音樂的論說，又如專門敘說西方歌劇發展的長篇大論。再如有關湯瑪斯·曼的小說專論，尤其是論喬伊斯的專著，比論說西方繪畫的篇章更灑脫。順便提一下，普魯斯特小說的評述，尚未完成。所有這些，似皆可視作此著的後續寫作。

回首二十年前的舊作，最擔心的就是，會感覺太過稚拙。結果發現，當年坐在九平方公尺陋室裏的埋頭疾書，至今讀來依然酣暢淋漓。除了對孔孟老莊的評說尚顯幼稚，整個論述神采飛揚得不行。不由暗暗佩服當年的充沛精力，幾乎每一章都是一氣呵成，而且讓二十年後的自己無從改起。過去哲人有說，人不可能二次走進同一條河流。如今有幸發現的是，區區無法將自己過去的著述原汁原味地重寫一遍。當時的諸多靈感，尤其是諸多妙語，是無法複製的。

此著出版之後，一直沒有認真細讀過。這次因為逐字逐句的校對，發現此著當年的那個單行本《給大師定位》，被出版者作了大段大段的刪除，並且不要說徵求同意，連招呼都不曾打過一個。因此，本人不得不在這裏作個聲明：在此著出版的幾個版本當中，推薦讀者閱讀允晨出版的這個版本。因為是由作者本人逐



字逐句校對過的。

此著在臺灣問世之際，正值一個全新的時代轟轟烈烈地降臨。其標記是臺北的太陽花，還有香港的雨傘革命。此著論說的切·格瓦拉那樣的人物，在這樣的新時代應該是過氣了，不再會引起年輕一代的興趣了。但此著所涉及的西方二十世紀文化，應該是個永恆的話題。記得當年此著在大陸以單行本面世時，出版者選用《給大師定位》加以命名。雖然知道那個命名自有一番深意，但倘若要我來命名此著的話，寧可選擇「讓風景永在」，更為貼切。是為序。

世紀之謎：末代沙皇家族慘案的真相

◎馬克·費侯 (Marc Ferro) 著 林舒瑩 譯



自1918年7月宣布尼古拉二世的死訊以來，就有二種說法爭論不休。第一種說法是，末代沙皇家族的所有成員都在葉卡捷琳堡罹難；第二種說法則持懷疑態度，認為只有沙皇一人遭到處決。

接下來的五份文件，為這個難解之謎提出了幾個重要的解答。它們證實在事件後不久，關於沙皇家族被處決的證據已經互相矛盾。

布爾什維克黨關於沙皇死亡的「官方」公告，發表於1918年7月23日的《烏拉爾日報》(l'Oural'ski Rabotchi)中：

根據烏拉爾地區農工會議暨紅軍地區蘇維埃主席團決議，前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二世於7月16到17日夜間，在葉卡捷琳堡進行槍決。他活得太久了，由於革命的仁慈，這個戴皇冠的兇手……

同份報紙第三頁的「電報」專欄，還有這則描述行刑情況的快訊：

莫斯科報導

史維爾德羅夫主席表示，他已接到前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遭處決的電報。最近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的步步進逼，已成為紅色烏拉爾區首府葉卡捷琳堡的嚴重威脅。在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反革命陰謀；他們的目的是從監禁他的人，也就是地區蘇維埃手中救出沙皇。因此，蘇維埃主席團決定在7月16日處決沙皇。尼古拉的妻子和兒子被送到安全的地方，和這個陰謀有關的文件則以特殊信件的方式送到莫斯科。這個陰謀建議安排一個訴訟，讓沙皇有機會為他所犯的罪行辯論。但形勢讓法庭無法召開會議。在主席團討論過讓烏拉爾蘇維埃做下槍決沙皇之決定的理由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判定烏拉爾蘇維埃的做法是不得不的作為。

因此，處決沙皇——以及因為特別指出「尼古拉的妻子和兒子被送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只有他一個人被處決——在這裏被認為和反革命陰謀，甚至和突然被攻克的威脅有關。主動權，以及處決方式的決定，似乎都回到地方當局手中。（「這麼做是不得不的作為」）。

第二個文件則和這些論點相反。這份文件出自戰爭事務專員托特斯基，他在幾年後轉述他如何從史維爾德羅夫 (Sverdlov) 口中得知沙皇及其家人之死。史維爾德羅夫是完成1917年「十月政變」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強人：

沙皇去世一、二個禮拜之後，我遇到史維爾德羅夫，問他：

- 沙皇在哪裡？
- 結束了，他回答，槍斃了……
- 那他的家人呢，在哪裡？
- 家人，和他一起槍斃了……
- 全部？我驚訝地問。
- 全部，那又怎樣呢？
- 他在等我回應，我沒回答……
- 誰做的決定？
- 我們在這裏決定，列寧認為在目前這種困難的情況下，不該讓這些顯赫的人活著。

無論是不是事實，我們知道有人讓托特斯基保持距離，而當我們知道他提出讓沙皇尼古拉二世

訴訟時，更讓人覺得驚訝。這句「那又怎樣呢？」也證明了史維爾德羅夫想要和托特斯基保持距離，同時表明他和列寧的默契。

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則相繼否認沙皇家族的集體屠殺：首先是1918年9月28日，《紐約時報》的外交特派員契切利恩 (Tchitcherine)；接著是1918年12月17日，《舊金山週日紀事報》(San Francisco Sunday Chronicle) 的後繼者里特維諾夫 (Litvinov)，以及1920年7月11日，《舊金山週日紀事報》的共產黨政治局成員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吉諾維耶夫 (Grigori Zinoviev)，更別忘了還有最瞭解德國革命軍團的行家拉德克 (Karl Radek)。

說的最清楚的是1922年5月，契切利恩接受《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的專訪，當時他正以俄羅斯大使的身分參加熱那亞會議：

問：蘇維埃政府有下令或授權處決沙皇的女兒嗎？如果沒有，這些殺人者有受到該有的懲罰嗎？

答：當時我並不清楚沙皇女兒的下場，我是從報紙上得知她們在美國。沙皇是被當地的一個蘇維埃處決的，中央政府事先並不知情。事情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佔領該地區的前夕。後來，在得知這個事件的主要事實之後，執行委員會才證實了沙皇的死。當時並沒有提到他的女兒。從這個地區被捷克斯洛伐克佔領開始，由於莫斯科也被佔領的關係，整個事件都不明朗。

這些說法在幾個月後遭到白軍參謀部長迪耶特里奇 (Dieterichs) 將軍的否決。迪耶特里奇將軍從1919年1月，就開始對末代沙皇家族的屠殺案展開調查。迪耶特里奇在1920年8月1日的《兩個世界月刊》(Revue des Deux Mondes) 中宣稱，這一切都是布爾什維克所散播的「謠言」和「謊言」：布爾什維克一方面宣布皇帝的死訊，一方面又推翻皇室其他人員及其隨從的死訊。他們想盡辦法騙取人民的好感。譬如，犯罪行為後第三天，7月20日，一列火車駛離葉卡捷琳堡，有人高調宣稱它帶走了皇室犯人。事實上，只有外籍女教師和皇后的朋友史奈德小姐 (Mlle Schneider)、韓德里柯夫 (Hendrikov) 伯爵夫人、納哥尼酒店老闆，以及僕從沃爾科夫 (Volkov) 與特魯恩

(Trupp) 幾個人搭上這班開往彼爾姆的火車。1918年8月22日，除了一名僕人逃走外，所有人都在彼爾姆附近被槍決。

一旦這個反駁可以消滅，所有來自布爾什維克黨的謠言與謊言都會重來，根據他們的說法，沙皇一直是活著。(p.25) 1918年12月17日，莫斯科發表了當中的一篇文章。里特維諾夫 [芬克斯登 (Finkelstein)] 在哥本哈根承認某部分的犯行，另一部分則否認。1920年4月，一份德國報紙刊登了一個自稱是德國戰犯的書信，稱其曾於葉卡捷琳堡參與尼古拉二世一個人的處決。[……] 為什麼會有這些具有傾向性的傳聞，對於瞭解俄羅斯靈魂的人來說，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就是為了在這個已經非常動搖的意識形態中，盡其所能創造混淆、紛爭、不安和帶有迷信性質的渴望，直到根深蒂固。

在此期間，1919年，法國駐西伯利亞軍團成員暨 Le Matin 報紙特派員喬瑟夫·拉席斯 (Joseph Lasies)，把他對於整個皇室家族被處決的疑問，告訴和白軍關係頗深，且持續與迪耶特里奇將軍保持聯繫的《泰晤士報》(Times) 特派員羅伯特·威爾頓 (Robert Wilton)。當時他的倫敦同事還懷疑他是英國戰爭部 (War Office) 的間諜……

盛怒的威爾頓對他說：「拉席斯少校，就算沙皇和他的家人都還活著，也還是必須說他們都死了。」

總之，位居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位置，整個政權第二號人物的斯維爾德洛夫，正式宣布沙皇已被處決。

相反地，他對托特斯基卻說一家人都被處決。外交專員契切利恩 (Tchitcherine) 則和里特維諾夫及吉諾維耶夫一樣，認為沙皇的女兒們都還活著。

但迪耶特里奇將軍及白軍則用武力否認其真實性。

然而，迪耶特里奇的摯友兼《泰晤士報》特派員羅伯特威爾頓說得很清楚：「即使他們都還活著，也還是必須說他們全都被處決了。」

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相信什麼？誰相信？

自由之路進行式

◎李敏勇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開始在《自由時報》「鑑鏘集」專欄，每週發表一篇以文明批評為視點的隨筆。那時際，我以一位台灣的詩人，勤於時論，加上詩文每週曾在報刊雜誌有五個篇幅發聲。從那時至今，台灣和世界都有很大的變化，本土與全球的政經文化，課題層出不窮。

歷經後李登輝、扁時代和馬時代，台灣以寧靜革命喻之的政權和平轉移，從

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八年，再復辟到馬的中國國民黨執政進入第七年期。我在「鑑鏘集」專欄，已結集為《文化窗景與歷史鏡像》(一九九九~二〇〇九，十一年間，每年選十篇)、《尋覓家國願景》(二〇一〇~二〇一一，二年約百篇)、《文明之光，國家之影》(二〇一二~二〇一三，二年約百篇)。《台灣，自由之路》是二〇一三~二〇一四，二年間的約百篇結集。

台灣自由之路，意味的是台灣邁向自由人共同體的歷程。二〇〇〇年，陳水扁以台灣人、非中國國民黨之民進黨人當選總統；二〇〇四年，連任。但二〇〇八年，民進黨失去國家政權，中國國民黨在馬英九當選後復辟了政權，讓台灣自由之路從寧靜革命開拓的新路受到破壞。《尋覓家國願景》



和《文明之光，國家之影》呈現的觀照、守望，既有台灣的挫折，也有反思與追尋。而《台灣，自由之路》從二〇一四年初到二〇一五年的巡梭，是從國家之影探看文明之光的蹤跡。

從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一四年，在本書分輯的「革命權」、「公民革命的號角響起了嗎？」到「復活的心」、「重建之路，改造之途」，是這段時間的旋律也是節奏。就在二〇一四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重挫了馬英九復辟的政權，重新讓台灣從挫敗中站起來，而不是任由殖民性統治權力宰制。

台灣的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是自由之路，是革命權行使的過程。面對中國國民黨挾持的「中華民國」，也面對中國共產黨挾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虛一實中國的前後、甚至並行宰制。台灣在二戰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仍陷於原被殖民、類殖民以及不完整的後殖民際遇，雖經政治改革運動長期化努力，走向全面選舉，並且在李登輝、陳水扁兩位台灣人總統時代，經歷以寧靜革命形成的新歷史，但因為「中華民國」主權條件與國家形式仍然陷於國共糾葛，導致中國國民黨從反共、轉而乞附中國共產黨，冀求以一個中國框架之外，阻礙台灣自我重建的努力。台灣的國家重建因而不能僅是經由選舉，參與鞏固中華民國實為虛構、殘餘他者中國政權的政治工程，而應該是生活在這個島嶼及周邊附

屬地域建構一個新國家的努力。對馬英九復辟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倒行逆施，革命權之行使更屬必要。

革命權之行使是天然人權，是近代國民國家天經地義的權利也是責任。這需要公民意識的覺醒，而公民革命的號角響起了嗎？從馬英九連任以後，更多的不公不義，更嚴重的傾中現象，讓台灣社會對於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更形反感，原先受馬虛情假意迷思的人們也從大夢中逐漸醒來。經濟發展的困頓，階級狀況惡化更影響民生，在哀鴻中公民革命的號角鳴響，馬竟成網路「十大惡人」票選之首。二〇〇八年到二〇一三年成為「被偷走的那六年」，柯文哲現象因而而起，人民期待一種新政治。對中國國民黨絕望，也對民主進步黨鞭策。

邁向二〇一四年時，我在〈二〇一〇年，祈願〉，以這樣的話語訴說：

——祈願市民 (或說公民) 社會能形成，擺脫長久以來封建社會仰仗權力高位的「老百姓」角色……

——祈願不分先來後到的台灣人，解脫中華民國黨國化的桎梏……

——祈願對在台灣重建一個新而獨立國家懷有夢想的人，從「拼經濟」的成長主義覺醒過來……

——祈願新文化、進步社會能夠形成……

——祈願地方縣市首長的改選、各縣市選民確實以施政表現衡量新的選擇……

——祈願台灣人民能夠從看煙火，賞小鴨的鬥鬧熱習性，稍稍沉靜下來……

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國家，要有復活的心。二

〇一四年的三一八學運，太陽花的革命性展現了台灣新新世代的榮光，重拾市民權、革命權，燃亮重建一個國家的光與熱，復活曾經死滅的台灣的心。台灣之春從立法院周邊，蔓延到凱達格蘭大道，新青年新新世代以新的視野掀起新的政治意識，新的政治改革動力，並召喚他 (她) 們的前行代，大聲宣示 TAIWAN, Yes; CHINA, No 的主體性。一種從近現代世界進步潮流反映的力量，向世界昭告呼應新的聲音，新歷史視野揭開序幕。這樣的力量重新將台灣喚醒，不只青年們要以自己的腳步追尋，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也戮力與共，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九合一地方選舉，重挫中國國民黨政權，迫使馬英九辭去中國國民黨主席，面對崩潰化的政治形勢。

作為一個詩人，我在「鑑鏘集」專欄，長期以來對台灣的守望，在觀照與批評中進行反思，以文明批評的視點留下見證，發出聲音。因為我堅信人類文明的進步是文化的展現，也是文化在經濟基盤上方的憧憬和引領，牽動政治這種關係條件。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福祉化、文化的優質化意味著文明性。我的觀照與批評是一種文明批評，環繞政治、經濟、文化課題，對台灣的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懷有積極參與的熱誠。

台灣，自由之路，既意味著一個新而獨立，異於中國的正常國家，屬於生活在台灣所有不分先來、後到的自由人共同體；也意味著持續努力尋覓的文明進程。在二〇一五年春，繼《文化窗景與歷史鏡像》、《尋覓家國願景》、《文明之光，國家之影》之後，謹將《台灣，自由之路》這本收錄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一四年的台灣守望之書，獻給關心台灣的人們，也謝謝長期以來持續與我一起在《自由時報》「鑑鏘集」共同巡梭我們尚未正常化國度的人們。

這不是太陽花學運

◎賴秀如（想想論壇主編）

《想想論壇》決定要出版一本跟 318 運動有關的書籍，是早在去年那殘酷的四月還沒結束的時候。當時我們只想著二十年後，今天出生的孩子要如何認識、理解那群衝進立法院議場和行政院大樓的年輕人的初衷？

有人說，2014 年的 318 運動傳承了 1990 年野百合世代的精神。現在 20 歲的年輕人要怎樣正確認識和理解他們出生之前的野百合學運呢？許多人腦中想到的，不是《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抗議記實》一書，就是《台北學運：3.16-3.22》這本。

但現在是網路時代，要認識、理解甚至是省思 318 運動，問 Google 大神最快。不只《想想論壇》網站已經有多篇精闢分析，新聞媒體從報紙電視到網路也鋪天蓋地大篇幅報導。緊接著，跟 318 運動有關的書籍如雨後春筍，幾乎以一個月一本的速度上市。甚至我們自家的年度精選《想想論壇選輯 II》一書也理所當然地編列了 318 運動專題。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麼？為什麼還需要（殘酷地砍樹造紙）出版這本書呢？我們在編寫這本書的時候，總是再三詢問自己，然後翻閱所有文字和圖片之後，又堅定自信地告訴自己：有需要！

又或者精確一點兒地說：我們想要。若要更精確地說，應該是：我們試著要。我們試著要把這段歷史寫到位，寫正確，寫給那些真的想要知



道真相的人看。

本書的作者晏山農會經畫龍點睛地道出：「目前已經出版的書刊，不管是談個人心得或論述，都預設全世界所有人都已經知道 318 運動的全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的確，你隨機問個路人知不知道去年的這響春雷？大家都會說：知道。但為什麼春雷響起？答案就未必相同。

這本書可說是第一本全面從歷史入手，按照時間和空間脈絡書寫的 318 運動全景圖。另外也罕見地詳細比較新舊媒體在這段時間交鋒的優劣，以及不突兀地刻畫各角落的公民身影。值得強調的是，我們企圖多角度貼近，全方位觀照這場運動，更不迴避運動期間的內外衝突。雖然在眼前的司法追殺壓力下，許多訪談細節未能現諸白紙黑字，但並不影響讀者對這場運動的深刻理解。或許一段時日過去，檔案逐漸解密，島嶼真正天光，讀者再回來閱讀本書時，會看出更多這裏那裏點到為止的故事細節，但這並不影響故事脈絡與結局。

今年二月，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慶祝創刊九十週年，有篇回顧文章中提到該刊專訪美國總統歐巴馬。大學時代就是校園刊物主編，歐巴馬深懂箇中滋味地對紐約客雜誌說：「人生苦短，我們無法在這短暫的時間內改造整個世界。但我覺得我們所做的諸多決定至為重要。」「終究，我們都是一則長篇故事的某個段落，」歐巴馬說：「我們只是試著要把自己的段落給寫對。（We just try to get our paragraph right.）」

儘管兩岸服貿協議該怎麼簽，至今仍是個未解的政治議題，但 2014 年的三一八運動，已經是台灣當代大河小說的重要段落。把這段落給寫對的第一步，就從正名開始。沒錯，「這不是太陽花學運」的靈感，來自傅柯解析的馬格立特名畫「這不是一支煙斗」。當四位作者和一群編輯七嘴八舌討論的時候，梁秋虹一倡議，馬上全體「啊！對了」，就這麼決定。這種靈光乍現，在 2012 年夏天和另一群人敲定《想想論壇》這個名字的經驗非常類似。

但接下來的是一連串（以下省略三十萬字）的訪談寫作與編輯過程，這過程需要感謝的人太多：感謝四位作者與許許多多受訪朋友的協助；感謝小英基金會諸位董事與主管們的耐心與支持；感謝《想想論壇》全體夥伴（尤其是小天使李牧）的辛勞與努力；更感謝允晨出版社以廖志峰為首的「苦主們」跟我們共度這段旅程。現在，我們可以很驕傲地向各位報告，我們很努力「寫好這個段落」了，鞠躬。

民主與公民參與

◎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

太陽花運動代表台灣公民的覺醒，他提醒我們美國詩人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的公民不服從，「當政府的暴政及無能如此巨大且讓人難以忍受之時，所有人都有革命的權利，亦即拒絕效忠及抵抗政府的權利。」

太陽花公民運動不僅對台灣政壇與民眾投下一顆震撼彈，對北京更如轟耳之雷，因為他們發現兩岸之間的問題，不是只有搞定上面幾個人即可，人民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而香港爭取特首普選的佔中行動引發這麼多香港人的共鳴，更是北京政府所無法想像的，為什麼中國在香港如此多的投資卻無法擷獲香港人的心。民主已經是普世的價值，它不只是一種制度的安排，也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全世界各地有多少人為它流血流淚。

不過，當我們還需要為我們的理念與想法站出來示威與抗議時，表示我們的制度或社會出了問題。憲法的產生是為了限制政府的權力與保障人民的權利，但是有了憲法並不能保證政府遵守憲法，因此我們還需要民主制度的設計，讓最終的權力掌握於人民手中。唯有政府了解到當他做不好時，便可能下台，他才會考慮到人民的需求與福祉。

民主不是只有選舉而已，本書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來談民主，包括五個部分：行政民主、國會民主、司法民主、草根民主，並在最後的附錄談到中國民主的可能性。

本書的第一章為行政民主，隨著國際國內事務的複雜化以及人民有越來越多的需求，行政權不斷的擴張已經是世界各國普遍的事實，使得對行政權的控制與監督更為重要，否則將形成行政獨裁。九月政爭突顯出總統身兼黨主席，且掌握了國會的過半，卻無須向國會負責的權責失衡問題。同時，更突顯出行政與立法的權力失衡，總統竟然想要透過黨紀來拔除立法院的龍頭。沒有任何民主國家的元首或行政首長敢動國會議長的寶座。作者認為要達到行政民主，除了國會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外，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與行政程序法甚至是建立類似歐洲的監察官制度都是必須的，當然更重要的是人民的覺醒與參與。

這一年來發生的重大事件，許多皆與國會有關，因此第二章探討國會民主。其中有牽涉行政與立法關係的，像是對行政院院長江宜樺的倒閣案以及前面提到的九月政爭案。其次，重大的社會議題皆需要國會立法，包括引發二十萬人走上街頭的洪仲丘案，迫使立法院火



修改軍審法、攸關食品安全的食品衛生管理法、苗栗大埔事件突顯區段徵收的惡法、通訊保障法與婚姻平權的同性婚姻等。另外，牽涉直接民主的問題，如公投與罷免的問題以及服貿協議所引發的問題牽涉到國會對於兩岸協議以及國際條約的參與監督問題。這些事件也顯現國會在民主國家的重要性，國會改革因此再度成為熱門議題。

司法民主一章提到司法審判不能因人而異，並企圖說明陪審、參審、觀審之差異以及為何要人民參與審判，以強化司法之民主正當性以及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草根民主主要探討地方自治制度在目前的現況下，雖然地方行政首長以及議會議員皆由人民直接選舉，但是在財政自主以及自治權限方面仍受到中央相當大的控制，常使得地方政府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最後的附錄部份提到中國民主，習近平上台之後，開始反貪打腐，並表示要推動協商民主制度化以及發展基層民主。當然對岸所談的民主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該章作者曾建元副教授認為至少是個開始。另外，還提到了香港人民爭取真普選一事，香港此次爆發如此大的能量，也表達出他們對中國控制的不滿以及對民主的渴求。

總而言之，這一、兩年來，台灣發生不少事情，讓所有的公民社會團體疲於奔命，也暴露出我國憲法體制、多項法律制度以及政府施政的諸多問題。我們感到慶幸的是人民在重要關頭站了出來，才不致使我們的民主節節倒退。這本書提醒我們台灣目前的民主危機，更督促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權益來參與。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書展座談會

日期：104 年 2 月 13 日 星期五

時間：11:00~11:45

地點：世貿一館黃沙龍

主講：單德興

與談：廖志峰

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以下簡稱「廖」）：各位先生女士早安，歡迎參加單德興老師《卻顧所來徑》的發表會。這本書去年十月出版，單老師那時正在香港進行研究，所以並未舉辦發表會，因此藉由這次書展，特別來介紹這本書。我非常喜歡單老師這本書，因為藉由它有機會接觸到很多作家和學者的心靈世界，對有心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實在不應錯過。首先想請問單老師，為什麼做訪談錄？是在什麼機緣走上這訪談路？做了多久？

單德興（以下簡稱「單」）：謝謝廖先生，也謝謝各位今天參加有點遲來的新書發表會。我涉入訪談是從翻譯開始，在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時，翻譯了《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一些訪談，出版為《文學心路：英美名家訪談

錄》，當中有不少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像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等。當初純粹是抱著好東西要與華文世界分享的心理，花了不少工夫，選譯了一些精彩的訪談，結集出版。至於自己從事訪談，始於一九八三年，那年舉辦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在場的李有成老師跟我當時就讀台大比較文學博士班三年級，張漢良老師要我們去提論文。當時我想寫論文探討《背海的人》，那時還只出版了上冊，一方面因為那本小說很特別，值得仔細探討，另一方面我在台大外文所碩士班時修過王老師的英美現代小說，受益匪淺，想趁寫論文的機緣跟他進行訪談，心想即使論文寫得不好，至少可留下一篇訪談，作為有關王老師的第一手資料。所以我先是在一九七〇年代翻譯訪談，一九八三年自己也開始做訪談，至今三十多年，樂此不疲，光是跟王文興老師就做了五次訪談，是我這些年來訪談最多的人。

《卻顧所來徑》收錄了八位名家的訪談，包括了昨天剛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的余光中老師和齊邦媛老師，因為美東大風雪無法前來參加這次書展的哈金先生，以及華裔夏威夷詩人林永得

（Wing Tek Lum），翻譯界的前輩劉紹銘先生，以及知名學者李歐梵教授和周英雄教授，總共八位、十一人次。所以這本書訪談對象都是名家，我從中受益良多。

廖：我個人喜歡讀訪談錄，因為可以直接進入受訪者的心靈世界，得到很多的東西，省掉很多枝節。不曉得做訪談三十多年的單老師，對一般讀者讀訪談錄會有什麼建議？身為出版人，我發現台灣讀者對訪談錄這樣的形式接受度不是很高。這到底是因為訪談的形式、受訪的人選、還是內容的緣故？

單：國際文藝界最著名的就是《巴黎評論》的訪談。該刊一九五三年創立於巴黎，想要建立特色，但預算有限，於是想到訪談的點子，就去邀請寫《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的英國小說家福斯特（E. M. Foster），福斯特很樂於協助這些文藝青年，只提出一個條件，也就是訪談



的謄稿必須經他過目。《巴黎評論》因為訪談一砲而紅，至今超過六十年，累計訪問的小說家和詩人超過三百位。很多人看《巴黎評論》主要是為了訪談。這些訪談在期刊發表之後，整理出書，名為《作家訪談錄》（Writers at Work），前後出

（文接四版）

《鯨騎士》、《吉普賽之王》作者 威提·伊希麥拉 (Witi Ihimaera) 來台見面會



日期：104年2月13日星期五

時間：18:00~19:00

地點：世貿一館主題廣場

主講：威提·伊希麥拉 (Witi Ihimaera)

與談：夏曼·藍波安

主持：廖志峰

翻譯：陳正杰

廖志峰：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安，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這一場分享會。《鯨騎士》的作者威提，七年前曾來過台灣，他很高興還有機會再來台灣。我們先用電影《鯨騎士》來回顧一下《鯨騎士》的精彩片段。

（《鯨騎士》電影播放）

我不曉得各位朋友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允晨在出版《鯨騎士》這本小說之前先看過電影，藉著這部電影，我們第一次看見紐西蘭，以及毛利文化這麼美麗的文化，尤其，這麼可愛的小女孩更是吸引了眾人的目光。這個小女孩出生在一個毛利酋長的家庭，她是一個被大家所喜愛的孫女，但卻是一個不被期待的女酋長。《鯨騎士》就是在講述一個女性如何在一個制式的成見裡奮鬥不懈的故事，非常感人。

本來在看完這段影片之後，我們邀請夏曼·藍波安老師來接著講他怎麼樣讀《鯨騎士》這本小說。大家如果去過蘭嶼的話，就會知道蘭嶼的新船在下海之前，也是有儀式的，這引起我們的聯想，也是一種文化關聯的表徵。蘭嶼的原住民是達悟族，依我們過去的說法是山地同胞，但事實上他們是一個海洋的民族，是原住民中唯一跟海洋、跟水最親近的一個族群。

由於夏曼老師還在隔壁的座談會上，還沒

辦法結束，所以我就把順序稍微對調了一下，先請《鯨騎士》的作者威提來談他的書。威提在台灣出了兩本書，一本是《鯨騎士》，一本是《吉普賽之王》，這兩本書，它的特色就是一本是寫女生的故事，一本寫男生的故事，但是我覺得《吉普賽之王》有很濃的成長色彩，它著重在描寫青少年的叛逆，但這種叛逆其實是對自身的一種成長，跟所謂的父權進行一種抗爭，一種權力的掌握，他描述的情感衝突是非常的強烈，小說寫得很精彩，有好幾個章節都令人看了很激動。

至於《鯨騎士》，我看電影跟讀小說的差異感非常大，我以為我看了電影後，可以不用看小說，可是我讀小說的時候，我覺得這本小說寫得非常細膩，它的章節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來推進，它的原書在每個章節之後就出現一句「時機已到」，原文是 Let it be done，我不曉得 Let it be done 到底應該怎麼翻譯，但是它就好像一種呼喚，每一個章節之後一直呼喚，然後把那個呼喚一直推到最後，成了一個結語，然後，一個酋長的誕生了，一種文化的傳承。他的文字非常細膩，尤其描寫自然的、聲音的、感官的、色彩的，我覺得充滿了作家獨特的想像，讓我們就用掌聲歡迎威提。

威提·伊希麥拉：（用毛利語問候大家）我很高興跟我的出版人志峰還有我的朋友正杰（口譯）跟各位見面。因為我是毛利人，我必須站起來跟各位做一個傳統問候。

（表演毛利人傳統歌曲）

剛在片中大家看到的那個獨木舟一定是朝著台灣來的，因為我在這個地方。我在這邊覺得很自在，因為我覺得都跟你們很像，我到台灣來才三天，我第一天到的時候就有人上來問我問路了；第二天我在誠品書店看書的時候，有一個小朋友到我跟前一直叫我爸爸，他牽著我的手，然後抬起頭來看才發現他牽錯人了。我們看起來長得很像。特別是對原住民來講的話，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毛利人相信我們最早是來自於台灣，因此我們跟台灣的原住民是有關係的。剛剛在片中也看到很漂亮的男生跟女生，長得也跟各位很像，我看到在座很多很漂亮的女孩子，我把妳們看像是自己的女兒一樣。

《鯨騎士》是我在 1987 年在紐約寫成的，

在座有多少人到過紐約呢？那時我在紐約時很孤單，而且很冷，冷得不得了，我想念我的家人，然後我的兩個漂亮的女兒，潔西卡和莉莉亞來紐約跟我一起度假。就在她們來看我的時候，有一隻鯨魚在紐約港擱淺了。我住在 67 街跟百老匯街的交叉口的一棟大樓裡，我從 33 樓可以看到港口上面有直昇飛機飛來飛去，我到窗前看到那隻鯨魚，就在我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在那邊噴水，我知道，牠是一路從紐西蘭到紐約來，就是為了看我，因此我就不再寂寞了。

我女兒跟我一起去看了很多部電影，那都是給小孩子們看的電影，像《星際大戰》，還有一部《美國鼠譚》，是講一隻小老鼠的故事。我的女兒潔西卡在看完電影之後跟我抱怨，她說：「爸爸，為什麼這些電影裡面的主角都是男孩子？我就跟天行者一樣可以駕駛太空船，莉莉亞公主也不能像我一樣能夠把人家打敗。」

我是兩個女兒的父親，我非常愛我的女兒，我希望我的女兒是宇宙的主宰者，我就想說我要寫一本鯨騎士的書，是女孩子而不是傳統上的男生到最後變成騎在鯨魚身上的騎士。我是在 1968 年就寫了這個故事，隔了 14 年之後它拍成了電影，就叫《鯨騎士》，同樣的名字。是不是很好看？

這些在電影裡面的演員都是我的親戚們，都是我的叔叔、嬸嬸、爺爺輩的那些人，他們大部分從來不曾演過電影，我跟他們講說他們要演電

（未完·待續）



（文接三版）

版了很多集，叫好又叫座。

再講一個有關《巴黎評論》的故事，以見其影響。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Orhan Pamuk) 二十五歲時，為了一圓作家夢，離開建築學院，專事寫作。寫作這一行風險很大，帕慕克沒有信心，就在那時讀到福克納在《巴黎評論》上的訪談，堅定了他寫作的信心，因為得知寫作的孤寂與煎熬並不只是他一人感受，而且普遍現象。



於是他堅持寫作，三十年後也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並為《巴黎評論》出版的《作家訪談錄》寫序，分享他的切身經驗。由帕慕克的親身故事可知訪談的影響力。而我也在讀過、譯過這些精采的訪談之後，也願意自己試試類型的深度訪談。

在華文世界比較多的是記者的訪談，但他們的寫作方式不太一樣，有些是用敘事來鋪陳訪談的重點及受訪者的特色。但我覺得一問一答的訪談另有特色，因為訪談者事先做了功課，擬出問題，當面詢問，必要時還可追問、盤問、詰問，然後將雙方的對話與交流呈現給讀者。因此，訪談者除了要做很多的功課之外，另一個重點就是要跟受訪者建立互信。在我的三本訪談書中，《卻願所來徑》在這方面的特色尤其明顯。像是余光中老師是我一九七〇年代初在政大西語系的老師，王文興老師是我一九七〇年代中在台大外文所的老師，齊邦媛老師則是我二〇〇〇年代初從事有關她生命故事的訪談（也就是她的鉅作《巨流河》的源起），其他受訪者也有十年以上的交情，由於多年

的互信，他們在接受訪談時都能坦誠相告。

我多年前便發覺中文世界經常有一套公式，就是訪問之前訪談者對一些事情感到迷惑，在與受訪的智者一席話之後，雨過天青、甚至有如頓悟了不少道理。其實我個人覺得不必那麼神祕化，只要扎實地準備，坦誠地交換意見，必要時深入追問，在一問一答、你來我往之間就有門道，深者見其深，淺者見其淺，各有所獲。而且，今天的訪談就是明天的史料，像國外一些著名作家和學者的訪談專書，都是很重要的史料。

廖：單老師剛剛講到一個重點。《卻願所來徑》雖是訪談錄，但訪談者本身也是名家，所以這本書可說是高手過招，單刀直入。剛剛單老師提到《巴黎評論》，我也喜歡讀它的訪談，但看的是中譯本。我讀的一期是「作家與作品一」，可惜一直沒機會找齊。待會請單老師談談《巴黎評論》的背景，以及西方讀者對訪談錄的接受度？

單：一般說來，西方讀者對訪談錄的接受度比較高，可能因為對話的形式在西方源遠流長，像是希臘時代就有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國的《論語》雖然也有對話或戲劇的成分，但

基本上是「子曰」的獨白。像是英國文學史的重要文獻，十七世紀新古典主義作家德萊敦的〈戲劇詩論〉(John Dryden, "d Essay of Dramatic Poesy," 1668)，就是以四人的對話來呈現，利於表達多元觀點，而一般論文主要呈現單一觀點。我覺得這些背景因素可能造成東西方讀者對訪談的接受度上的差異。

再舉個明顯的例子，我除了翻譯《巴黎評論》的訪談，我也譯過聖嚴法師的《禪的智慧》，那是他在美國道場與信眾的對話錄。他早年的名著《正信的佛教》雖然形式上是一問一答，其實每則回答都是針對一個問題/專題所寫的文章。而且東方社會普遍尊敬長者，尤其是宗教人士，所以法師講什麼話，基本上不會去質疑、追問、辯駁，即使不懂，也只怪自己悟性不足，慧根不夠。但在西方，不懂就問，也不管對方是不是權威，自己的問題是深是淺，所以，西方人習慣於這種思辨、對話、辯論的過程，反而激發聖嚴法師進一步發揮、闡述，讓彼此受益。我想這也部分說明了訪談錄在西方的接受度比較高的原因。我個人覺得訪談錄可以視為一種文類，有其迷人之處，那就是為什麼我這三十年來樂此不疲。

（未完·待續）